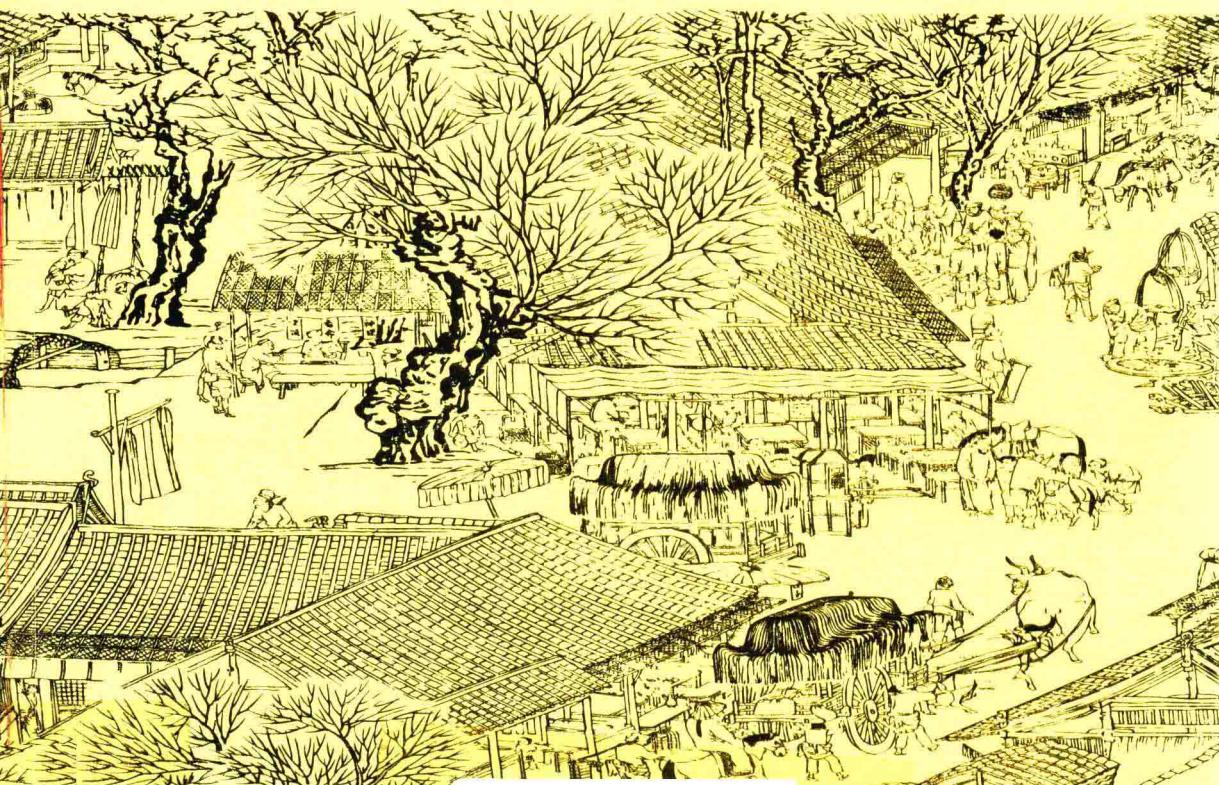


揭开一个被铁蹄与悲情遮蔽的惊艳盛世！

大宋帝国三百年_⑥

真宗赵恒：公元997年至1022年军政故实（上）

金纲 /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大宋帝国三百年_⑥

真宗赵恒：公元997年至1022年军政故实（上）

金纲 /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Phoenix Art Publishing Group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大宋帝国三百年. 6, 真宗赵恒 : 公元997年至1022年军政故实. 上 / 金纲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 (2016.4重印)

ISBN 978-7-5399-9011-8

I. ①大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中国历史－宋代－通俗读物 IV. ①K244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320205号

书 名 大宋帝国三百年 ⑥
真宗赵恒：公元997年至1022年军政故实（上）

著 者 金 纲
责 任 编 辑 孙金荣
特 约 编 辑 李玉峰
责 任 校 对 孔智敏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 版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239千字
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2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9011-8
定 价 45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写在前面

澶渊之盟与鲍岑和约

大宋，帝国领袖，真宗赵恒，他的时代自公元 997 年开始，至 1022 年结束，实算总二十五年。

此际，世界史上，在军政领域，发生了很多大事件。

德国人维尔纳·施泰因编纂的那部《人类文明编年纪事》，记录了这期间“征服与反抗”齐进、“战争与和平”共在的风景。荦荦大者可见——

有“圣徒”之称的斯特凡一世登基为匈牙利国王。

罗马－德意志皇帝亨利二世先后三次出兵意大利，击败了占据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，并最终征服意大利，恢复了强力统治。

波兰开始不断割让领土，波莫瑞割让给丹麦，摩拉维亚割让给匈牙利，基辅割让给俄罗斯，上劳其茨割让给德意志。

爱尔兰开始分崩离析，英国人的影响开始增强。

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在斯伏尔德战役中阵亡。丹麦开始管辖挪威。

威尼斯控制了亚得里亚海。

南印度朱罗王国国王加里占领今天的斯里兰卡。

诺曼底农民起义，被镇压。

丹麦国王赶走了强行传播基督教的挪威国王奥拉夫二世后，征服了英国，并出任英国国王。但后来所有在英国的丹麦人被杀，丹麦开始报复性征伐。

东罗马摧毁西保加利亚王国，占领马其顿。

这一时期，大宋在真宗领导下，与契丹有了长达五年的拉锯式战争，我称之为“五年战争”。最后，在澶渊小城的对峙中订立和平协议，史称“澶渊之盟”，时间是景德元年，公元 1004 年冬。

有意味的是，这一年，德意志国王亨利二世与波兰国王波列斯拉夫之间的战争刚刚开始，也在近五年之后，德意志在夺取波希米亚得手之际，与波兰人在德国的小镇鲍岑缔结了和平协议，史称“鲍岑和约”，时间是公元 1008 年中。

11 世纪的这二十五年，东西方似各有一个通往“和平”的和议。但发生在中国的“澶渊之盟”和议之后，大宋与契丹，百年之内没有战争；而发生在欧洲的“鲍岑和约”之后，不到十五年，德意志即与波兰战火重燃，

以至于波兰被迫放弃王国称号，承认德国的宗主国地位。就这个历史阶段，以大义衡量，“澶渊之盟”的缔结者，似更重契约精神。而德意志与波兰，则稍逊一筹。

大宋、契丹之“和议”成功，缘于帝国以“敛天地之杀气”为手段，以“召天地之和气”为目标的政治哲学的恪守与推演。

真宗时代，除了“五年战争”“澶渊之盟”“东封西祀”之外，似乎并无特别重大的事件。但是当我借助现代史家的眼光和传统圣贤的理念，进入这个四分之一世纪时，发现了“和平事业”暗合于“协和万邦”之《尚书》思想的邃密、雄深，以及不可思议的丰富。

我讲述“故实”，并期待因此而证实传统经学正当性的秘密。这个工作，可以简称为“以史证经”。

现在，在展开讲述真宗大帝的故实之前，先选择若干饶有意味的片段——这些片段，构成了一个个“意义空间”，有待于有心人去打开它、阐释它——作为这部书《写在前面》的话，供你品味，看看这部书值不值得读下去。

“谋逆者”王继恩

真宗赵恒，继太宗赵炅之后，来做大宋帝国第三代领袖。但在通往领袖的路上遇到政治风险，差一点坏在老宦官王继恩手上。

王继恩善于将帝国领袖当作“骰子”，将自家性命当作“赌注”——“押宝”。他生平最成功的一注“押宝”是在赵匡胤死后。那时节，他不接

受宋皇后的懿旨，不召皇子赵德芳入宫，反而召来了晋王赵光义（也即赵炅）。如此，就在那个大雪初霁的夜晚，启动了大宋太宗时代。王继恩“押宝”赌赢，从此得到领袖恩宠，有了二十一年的人生巅峰。太宗死后，他再一次“押宝”，试图阻止太子赵恒继位，而与太宗的李皇后等人策划谋立已经废掉的皇子赵元佐。初夏的那个清晨，他摆出资深元老礼贤下士的派头，来到相府，召宰辅吕端进宫，讨论继承人问题。但吕端“大事不糊涂”，略施小计，将这位自以为老谋深算的宦官首领诱骗到书房，并反锁在里面，而后，匆匆来见李皇后。吕端一言九鼎，维护了太宗昔日与寇准等人的君臣约定：太子赵恒践祚，既定程序，不可变更。

不难猜想，王继恩“押宝”失算，他从吕端书房的门缝中望着那块安静的锁头，应该明了：往日已矣。他的政治癫狂，试图影响最高权力再分配的动作，在任何朝代都要付出生命代价，但真宗赵恒并没有像想象中的帝王那样大开杀戒。这就与“敛天地之杀气”“召天地之和气”的大宋政治哲学有关。

太宗赵炅，驾崩于公元 997 年 5 月 8 日，这一天是大宋至道三年三月癸巳。太子赵恒在灵柩前继位，随即发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书，史称《真宗即位赦天下制》，简称《大赦令》。这个诏书的性质仿佛现代民主邦国的“总统就职宣言”，是一份昭告天下的政治文书。

诏书云：

……先朝庶政，尽有成规，谨守奉行，不敢失坠。所宜开谏诤之路，拔茂异之材；鳏寡无告之民，悉令安泰；动植有生之类，冀获昭苏；庶几延宗社之鸿休，召天地之和气。更赖中外百执，

左右荩臣，各罄乃诚，辅兹不逮。布告迩遐，咸使闻知。

意译一下这段文字：

……太祖太宗朝的政务，都有成规，朕将恭谨奉行，不敢让这些成规丢失。现在应该做的是广开谏诤之言路，提拔优异之人才；要让鳏寡孤独，以及上告无门的弱势群体，都能平安安居；让动物植物，以及所有的生命，都有机会获得苏醒再生；这样才有希望延续祖宗香火的大美，感召天地之间的和气。更希望朝廷内外文武百官，左右近臣，能够各自倾尽忠诚，辅佐朕所达不到的缺失。以此布告远近，让天下人都知道朕的意思。

诏书说了几件事：

- 一、要保持大宋开国“祖宗”（太祖太宗）的政策连续性。
- 二、要广开言路，奖拔人才。
- 三、要扶助弱势群体，并推及有生万物。
- 四、之所以这样做，一是为了“延宗社之鸿休”，二是为了“召天地之和气”；而后者更是前者之目标。

熟悉大宋三百年史就会有感觉，大宋诸朝恒定不变的主题“天下为公”在此。与太祖太宗比较，真宗更重此道，“召天地之和气”，就要“敛天地之杀气”。真宗在这个方向上有更自觉的意识。

顺便解释一下：“鸿休”，是“宏大的吉庆、美好”之意，可以简译为“大美”或“大业”。

《大赦令》诏书一下，“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”，即平常规定遇赦不赦的罪犯，这一次也全部赦免了。

王继恩事发，已经在《大赦令》期限之后，但真宗还是没有动杀机，

只将他黜为右监门卫将军，流放到均州安置，最后死在被贬之地。右监门卫将军虽然属于有职无权的武官散职，但毕竟还算朝廷官员。真宗没有痛下辣手。

与王继恩一道谋划“押宝”的还有参知政事李昌龄、知制诰胡旦等人。参知政事是副宰相，负责相当于中央政府的政事堂也即中书的日常政务，重新“任命”皇上，也要政事堂下文书；知制诰则是政事堂的一等秘书，负责起草政府文书。所以王继恩要更动太宗遗诏，改换天子，就需要这些人的支持。这三人再加上李皇后，构成“后太宗时代”非常时期的“四人帮”。他们阴谋败露后，真宗一个未杀，一个未关。

李昌龄不过被“责授”忠武（治所在今河南许昌）节度使。“责授”是职官制度常用语，含有“惩罚责备而贬官”的意思。

胡旦被贬为散官，后来他患有眼疾，视物不明，以秘书省少监的职官身份致仕，即退休。

李皇后则没有得到任何处罚，甚至被尊为皇太后。她原来居住在西宫嘉庆殿，真宗很孝敬这位不是生母的母后，为她另外建造了一座更舒适的万安宫。李氏生病时，真宗会亲自调制汤药，在朝堂上也常有忧戚之色。后来李氏病重不起，真宗说话都带着哭腔，多次下诏到民间去招募良医。李氏死后，还被葬在太宗的陵寝之旁。

王继恩由宦官班首贬为武职闲官，李昌龄由政府副首脑贬为省部级官员，胡旦由政府大秘贬为闲职，后来再升为朝廷秘书处副秘书长，李皇后则不仅不问不处理，甚至得到皇太后的尊贵待遇。诸位“谋逆者”，无一死罪。这些，成为真宗践祚后，大宋帝国“敛天地之杀气，召天地之和气”的一个注脚。

真宗“英断”

真宗很和气。

但他的和气有大气象。

他是太宗的第三个儿子，原名赵德昌，后改为赵元休，又改赵元侃，立为皇太子后，再改名为赵恒。

就像太祖太宗出生时有“异象”一样，他出生时也有“异象”。据说他的母亲，即太宗李皇后，曾经做梦用衣服的前襟兜着太阳玩，然后就怀孕了。他出生时，太宗正做开封尹，据说那一天“赤光照室”。他的左足有奇异纹路，细看像一个“天”字。他小的时候很聪明，与诸王游戏，喜欢做战阵的模样，还自称“元帅”。太祖很喜欢这个小孙子，无人上朝时，小孙子就会爬上金銮殿的宝座坐一坐。太祖有一次抚摸着他问：“天子好做吗？”小孙子回答：“由天命耳。”太祖很是惊奇。

赵恒出生于公元968年，践祚时年届而立，大宋建国已经三十八年，帝国开始出现太平气象，除了局部地区的小型叛乱和契丹在河北北部的骚扰之外，真宗接手的帝国还算稳定。

他封赏了帝国第一功臣吕端，在宰相职务之外，又加右仆射。宋代加官类型繁多，右仆射属于“检校官”类型的加官，在宋代是一种仅次于“太师、太傅”之类的荣誉，史称“特崇奖之”，特别给予崇隆的嘉奖。

诸兄弟改封诸王，这是对皇室诸亲的特权优待。所谓“王”，虽然并无实际职权，但毕竟是一种爵位荣誉。

又以太子宾客李至为工部尚书、李沆为户部侍郎，二李并为参知政事，也即副宰相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二李成为真宗一朝最重要的辅佐大臣。

就在这时，契丹国主耶律隆绪忽然从草原深处到达了幽州（今北京）。

虽不清楚契丹此举的目的何在，但不能排除草原帝国试图在大宋国丧期间南下侵扰的可能性。真宗应对契丹异动的战略安排是，首先派遣老臣郭贽前往大名府（今属河北邯郸）做知州。

大名府乃是过去魏博军节度所在，又称天雄军，是唐末以来河北三镇之一。自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，三镇最北端的幽州一镇已失，中部诸州就成为大宋与契丹的边界，南部就是大名府。事实上大名已经成为拱卫河南中州的北部要塞，大名一失，契丹铁骑即可直驱南下，陈兵黄河北岸，过河就是汴梁。因此大名对大宋，有特殊的地缘军事意义。郭贽做过盐铁使、参知政事，善于发现人才，真宗此一任命，对他应有期待。

但郭贽不愿意去做大名府知州。

任命后第二天，郭贽请求与真宗对话，史称“请对”。见面后，郭贽恳切地提出辞呈。真宗不同意，回答他就一句话：

“大名是魏博重地，卿应该赶紧去上任。”

郭贽不得已，退下。

真宗召来辅臣问：“郭贽不想上任，愿意留在朝廷，这事可以吗？”

辅臣回答：“近例也有这事。大臣不愿外放，可以留下。”

真宗回应道：“朕初嗣位，命贽治大藩而不行，则何以使人！”朕刚刚践祚，命令郭贽去治理大的藩镇，但他不愿意去。如此，以后如何调遣他人！

最后，没有答应郭贽的请求，还是派遣他到大名府上任去了。

有宋一代，帝王外放大臣，大臣往往“拒命”，帝王往往“优容”，一般不治罪，愿不愿意到地方，可以协商。但这一次，“和气”的真宗坚持

任命不变，此事得到后来史论的赞誉，仁宗朝的大臣吕夷简就评价真宗此举为“英断”，将此事与当年太祖贬黜中书舍人赵逢一事相提并论。赵逢乃是前朝老臣，太祖征伐泽、潞（均在今山西中部）李筠时，他跟太祖从行。但他害怕战事之险，畏避山路之艰，假称坠马伤脚，留在内地。太祖于是将他由朝廷命官贬为地方小官。政治家自有责任伦理，令必行，禁必止。在文明邦国共同体之间，上级调遣下级，下级理应服从。唐末以来迄于五代乱世，“权反在下”，上级纵容下级，下级抗命上级，成为反复出现的军政现象。真宗上任伊始，在国家秩序问题上，有惩前毖后之诉求。调派郭贽守边，令出不变，事情虽小，立意却深。

庆幸的是，契丹那边暂时没有大的动作。

这一年，真宗赵恒正值而立，三十岁。

“孟士”李应机

真宗赵恒还在做太子时，曾以寿王身份担任开封府尹。有罪犯逃入附近小县咸平，知县是李应机。赵恒派出散从小吏带着他的手帖（相当于后世的介绍信）去抓捕。在咸平县大堂上，散从们仗恃着来自王府的身份，没有把小小的知县看在眼里，有了喧哗失礼的举动。

李应机发怒：“你们所服侍的是寿王，我所服侍的是寿王的父亲。服侍父亲的人，可以鞭打服侍儿子的人。”

于是给这几个散从小吏每人二十杖，算作用了刑。

散从们回到王府，向赵恒哭诉此事。赵恒不回答他们，只是默默地记

住了“李应机”的名字。

等到赵恒登基，还没有改元，川中有乱象，就提拔李应机为益州（今四川成都）通判，并召他到殿中说：

“朕正在以西蜀之事发愁，所以任命你来做这个官，但这个官职还不是你将来能做到的大任。你权且去，地方有什么重要事情，可以用‘密疏’传给朕看。”

所谓“密疏”，就是写给皇上的密信，传递中要封裹，他人不得偷看。

李应机到益州后，有一位“走马”要回京奏事，益州知州来为他饯行，刚刚做了通判的李应机，应该算益州的二把手或三把手，按礼应该陪一把手知州出席宴会，但他却称病不来。“走马”认为李应机不给他面子，心中不免怀恨。

所谓“走马”，乃是“诸路经略安抚总管司走马承受并体量公事”的简称，一般称为“走马承受”，为宋代职官名称，职责是类似监司的路一级（省一级）监察官，主要是监督诸路武职官员，每年要向皇上汇报一次地方政情军情，遇到紧急情况，可以随时汇报。后来又规定，可以“风闻奏事”，也即听到什么风声，即使没有证据，也可以汇报。这是大宋帝国对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势力预防性质的制度性制约，对于沟通地方与朝廷的联系，具有隐秘的效果。这一职务后来又改为“廉访使者”，再改回“走马承受”，历来多有变化。由监察而监督，由监督而抑制，地方诸路也因此而无法再膨胀为割据势力，对帝国治理的有效性而言，“走马”这一职官制度设计，作用不小。

“走马”仗着朝廷耳目的身份，往往也有侵凌地方、肆意作恶的记录，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不论。

知州为“走马”饯行之后的当晚，李应机又找到这位“走马”，对他说：“我有‘密疏’，要你顺带到京师入奏，明天你不能走，等我草写完毕给你再说。”

“走马”不知道李应机已经受得皇上秘派旨意，听他这样说，就更为不满，勉强答应下来。

第二天，“走马”派人对李应机说：“我就要走了，请你把所要入奏的‘密疏’让使者带给我。”

李应机让使者回话说：“我这‘密疏’不能交给别人，你应当过来自取。”

“走马”大怒，但还是忍着，欲将李应机这类“骄横”之事累积起来，到时候一块向真宗汇报。于是硬着头皮走到李应机的府邸，取了“密疏”，向京师汴梁而去，一路上都在想怎么编派他的不是。

不料到了宫禁，皇上第一句话就问他：

“李应机无恙乎？有疏乎？”

李应机最近挺好的吧？他有“密疏”给我吗？

“走马”这才意识到李应机乃是皇上派出的亲信，来时想好的一通坏话也说不出来了，愕然中，将“密疏”呈上。真宗拆封，认真看了一遍，不断点头称善。又问：“李应机在益州治理地方，怎么样啊？”“走马”已经不敢编派坏话，反过来说了一番称誉的好话。真宗对“走马”说：

“你回去告诉李应机：他所上奏的意见都很好，朝廷就要施行。如果还有其他意见，尽力传来我看。蜀中无事时，很快就会召他回京了。”

不久，李应机回京，再次得到提拔，几年中，成为朝廷显官。

但李应机为官虽然“强敏”，刚猛强健，机智敏捷，却有贪财的恶习，而且行事多处现出权诈之象。这些，也被真宗看在眼里，所以渐渐疏远了他。

“和气”的赵恒很希望能有“猛士”来守四方，敢惩罚王府小吏的李应机，似乎很有点“猛士”范儿，于是得到重用。但一旦发现这类“猛士”存在道德上的缺陷，他就不再欣赏。真宗不是“事当务实”的功利主义者，而是“天下为公”的道义主义者。（“事当务实”，是五代名臣冯道语录，此语曾被王夫之痛贬，详见《大宋帝国三百年》第一部。）

缉盗三害

咸平五年（1002），这是真宗登基之后的第五个年头，指挥使马翰请求缉捕在京的“群贼”。真宗对辅臣们说：

“我过去做开封尹，听说马翰以缉捕贼盗为名，结果反生出‘三害’来：民中豪富怕他‘纠察’，于是经常厚厚地贿赂他，这是一害。每一次抓住贼盗，收缴贼赃，他都会报一个足以让贼盗判处死刑的上限之数，送官；多余的贼赃，都被他独吞，这是二害。他因此经常蓄养着十几个无赖，到各处去‘侦查扰人’，这是三害。但是因为马翰的这些事还没有显著败露，因此还不能就罢免他。从今以后，捕获贼盗之事，只委托开封府有司来做，不要让马翰参与其事。”

这一则故实中，蕴含的军政信息相当细密，治史，自可从中寻绎端倪。这里至少可以看到，即使法网恢恢，也总有顽劣宵小之辈，以“寻租”为手段，危及民生。就人性之贪婪而言，古今以来的“小人”并无太大差别。但凡是危及民生之人，一旦劣迹昭彰，帝国必行抑制之法；当其并未昭彰之时，帝国则尽力“曲突徙薪，预为之防”。

“诛斩贼盗，捕获叛亡”，是《千字文》中的句子。这种行为，几乎在所有文明邦国都被视为必须实施的治理要素。真宗的优异之处在于，他知道“兴一利”时，往往会“有一害”，如果只注重“缉捕”群盗，则官员因此而谋取私欲利益之手段，就会乘虚而入。

但帝国在官员没有显著大恶时，往往采用“优容”政策，尽力不去“法办”，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做“新民”。真宗在朝堂与诸辅臣说这个话，就是要传导给马翰听，激发起他的羞耻之心。帝国在尽力“敛天地之杀气，召天地之和气”。从五代走来的大宋帝国，对道义建国有自觉性。

“曲突徙薪，预为之防”，是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基本国策。

“敛天地之杀气，召天地之和气”，是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基本精神。

惩治无赖的策略

“敛杀气”“召和气”的帝国，仍不乏豪横顽民，就像今日美利坚，仍有枪杀无辜儿童之凶顽，谋害同床妻子之邪僻，不稀奇。“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”。世界必然参差不齐，道德亦然。那种试图令道德水平划一的讨论，皆类梦呓。故圣贤对待此类问题的姿态是：教化天下，但永远不做“毕其功于一役”的春秋大梦。

真宗时，曹州有赵諫、赵谔弟兄俩，都是凶狡无赖之徒。他们常常常用恐吓手段诈人钱财，并交结官吏，乃至不时干预地方政务。围绕着赵諫、赵谔更有许多“小兄弟”，也都横霸一方。二赵行径仿佛“黑社会”。

有一个太常博士李及，受诏要通判曹州。赵諫正好有事来到汴梁，听

说李及要做家乡父母官了，就递上一张名片求见。但李及拒绝了他。赵諫大怒，谩骂而去。

随后，赵諫就开始给李及编造故事，制作成帖子，四散递送，诋毁他的名誉。

李及看到后，因为是赵諫匿名，不敢发作。

正发愁，有一个大理寺丞名叫任中行，恰与赵諫同乡，知道他的劣迹，就写了秘密的表章上给朝廷。这才算是挽救了李及。

随后开始搜查赵諫豪宅，得到他与朝士、内侍以及地方官的来往书信很多，赃款“巨万”。这个“巨万”在古汉语中不是“巨大到一万”的意思，而是“巨额很多万”的意思，有说法甚至认为“巨万”就是“万万”，也即一个亿。总之是说家资超富。

诏下：二赵并斩；同党决杖流放；与二赵来往密切者人人降官或黜免。

真宗认为这两人危害地方，性质恶劣，打算“穷治”与二赵交游的朝官。御史台也审讯出一个名单，应有七十多人要下狱。

负责司法的中丞吕文仲“请对”，请求见皇上说话。他说：“被逮捕的人，太多，很多都在外郡，如果全部拘捕，臣担心惊动天下。”

真宗说：“爱卿你正在执掌国家宪法，当疾恶如仇，岂能公开地来庇护这些人呢？”

吕文仲说：“臣所在的中司这个职务，不仅是举发、纠正臣辅过失，还要顾全国家大体。现在就算这七十多人都犯了罪，以陛下的仁慈，一定不会全部正法，顶多不过废弃罢黜罢了。那样就会造成官员缺失。臣意见是：只需要记录这些人的名籍，继续考察他们的为人，如果还有过失，那